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修订本)

杨齐福/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修订本)

杨齐福/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石笑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杨齐福 著. —修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ISBN 978-7-01-012774-3

I. ①科… II. ①杨…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②文化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1.3②K2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752 号

科举制度与近代文化

KEJU ZHIDU YU JINDAI WENHUA

(修订本)

杨齐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2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340 千字

ISBN 978-7-01-012774-3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近代社会转型与科举制度革废	(10)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10)
第二节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危机	(13)
第三节 近代科举制度的革废	(33)
第二章 传教士与近代科举制度改革	(65)
第一节 传教士对科举教育的批判及对科举制度的反思	(65)
第二节 传教士在华活动对科举改革的影响	(80)
第三章 新观念的生成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	(100)
第一节 近代人才观的演变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	(101)
第二节 近代教育观的蜕变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	(115)
第三节 文化心态的转换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	(131)
第四节 学术风尚的转移及其对科举制度的冲击	(145)
第四章 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度的终结	(159)
第一节 新式学校的产生及其与科举的斗争	(159)
第二节 书院改革的兴起及其与科举的剥离	(175)
第三节 留学教育的崛起及其对科举的瓦解	(183)

第五章 社会舆论与近代科举制度变革	(192)
第一节 科举制度废除前的社会舆论	(192)
第二节 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舆论	(198)
第三节 《申报》中有关科举改革的主张	(204)
第六章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文化的演进	(211)
第一节 科举改革中儒学的衰落	(211)
第二节 科举改革中西学的传播	(213)
第三节 科举制度废除与学术范式的重构	(215)
第四节 科举制度废除与教育发展的偏差	(218)
第七章 多元社会视阈下之科举制度废除	(233)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帝制中国的终结	(233)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的嬗变	(235)
第三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士人群体的解体	(241)
第四节 科举制度的废除后之私塾与塾师	(243)
第八章 晚清科举政策之评析	(255)
第一节 晚清科举政策的制定	(256)
第二节 晚清科举政策的内容	(257)
第三节 晚清科举政策的执行	(262)
第四节 晚清科举政策的特点	(266)
第五节 晚清科举政策之评价	(272)
第九章 清末科举制度的残余形态	(274)
第一节 旧式士人之考试	(274)
第二节 新式士人之考试	(276)
第三节 科举残余现象之阐释	(279)

第四节 科举残余现象之影响	(282)
附录	(287)
主要参考文献	(324)
后记	(332)

绪 论

公元598年，隋文帝“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是科举制度的萌芽。隋炀帝时始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设立。^① 科举制度创立于隋，盛行于唐，发展于宋，衰亡于明清，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并与君主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官员铨选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与教育紧密相联的考试制度。^②

① 科举制度究竟产生于何时，这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其因在于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特征有异议。早在20世纪30年代，邓嗣禹以考试制度和进士科的出现作为科举制度起源的标志，提出科举制度始于隋，而俞大刚则以士子投牒自进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认为科举制度始于唐。尔后，一大批国内外学者也都主张科举制度始于隋。近年来一些学人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黄留珠认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是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这不仅是科举制度与察举制的根本区别，也是科举制度与其他入仕杂途的根本区别，因此他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设进士科。阎步克则认为“由王朝设科而士人自由投考”是科举与察举的根本区别，隋朝进士科没有自由报名这种形式，在形式上仍属察举科目而非科举科目，所以进士科始于隋而科举制则确立于唐。金铮认为科举制度正式产生是在唐代而不是隋代。何忠礼经过多方论证，认为史书中记载进士科始于隋的说法查无实据，且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际实行的是察举制，士子投牒自进正式出现在唐代，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于唐代而不是隋朝。徐连达、楼劲却认为“汉代实为科举初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隋代说在国内史学界基本上已成为定论，并贯彻于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参阅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民国考试院1936年；黄留珠：《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② 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来看，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与小农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产物。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后期大家族田庄的瓦解与个体家庭经济的普及，是科举制度出现的经济原因。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是零散、琐碎，蕴涵着平均主义的自由竞争精神。而科举制度不仅在基本精神上与之完全合拍，而且在发展程度上也与之完全同步。它是与知识阶层下层要求政治地位的欲望相适应的。这些人既无家世可以炫耀，又无特权可以依恃，因此他们要求通过平等竞争参与政权。实际上，科举制度正是他们的发明，而不是专制统治者的创造。（参阅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统治者在人才选拔机制上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从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到秦朝的军功封爵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士大夫都世代享有官职与俸禄的特权。这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它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入仕途径，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僵化。春秋战国时，各国招贤养士之风盛行，世卿世禄制受到严重冲击。秦朝实行军功封爵制，废除了世卿世禄制。汉初，封建政权以军功贵族为主，缺少经邦治国之士，而官僚机构的运作亟需各种人才，于是汉代建立了以察举制为核心的选人制度，并附之征辟、赏选等形式。^① 这些途径为两汉官僚政权解决了人才选拔的问题，但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因察举重在以道德评判，而道德的标准是很难以客观、公正、划一的尺度去衡量、验证的，这就造成举主任人唯亲、鱼目混珠，被举者矫情造作、欺世盗名。“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② 到了东汉末年，这种弊端更是暴露无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 两汉察举制遂被魏晋九品中正制取代。曹魏政权首创九品中正制，“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④ 这种由政府官员与民间人士共同评定以荐举职官的做法，似乎比出于一人之意的察举要少一点随意性。因此，“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⑤ 但后来门阀世族控制了选官制度，遂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成了世袭制的翻版，科举制遂应运而生。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方式，凭文取人，使人才选拔有了客观的标准和衡量的依据，也使选官用

① 察举就是由三公九卿、郡守之流“择吏民之贤者”，荐于朝廷，这是当时选官与入仕的主要途径。此外，皇帝直接聘人做官谓之“征”，长官任用僚属谓之“辟”。同时人们还可以向政府纳粟若干，自备车马行装到长安听候朝廷选用，时称“赏选”。

② 《苏轼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724页。

③ 葛洪：《抱朴子》，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127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五），中华书局1956年，第2178页。

⑤ 房玄龄等：《晋书》（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8页。

人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可以说是中国选举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邵作舟在评述历代选举之法时曾高度评价科举制度。他说：“夫先王庠序经诵教养之美，既不复施于后世，而乡举里选公卿荐辟之法，又适以便奔竞浮躁之徒，然则上之进退黜徙，独有以示天下之公者，科举之一途而已。”^① 顾颉刚则说：“隋代一统，……废九品而创进士科。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才亦益均，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独立发展，蔚为盛典，盖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② 吕思勉也说：“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九品中正制无论矣，即汉世郡国选举得之者，亦多能奔走标榜之人，……惟科目听其投牒，而试之以一日之短长，当其初行时，尚无糊名易书之法，主司固得采取誉望，士子亦得托人荐达，或竟自以文字投谒。究之京城距士子之乡土远，试者与所试者关系不深，而輶轳之下，众目昭彰，拔取苟或不公，又可加以复试，亦不敢显然舞弊。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投牒自列，即不得不就而试之，应试者虽不必其皆见取，然终必于其中取出若干人。是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循私举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循私舞弊之限制，而亦人人有服官之权之所以兑现于实也。”^③

科举制度曾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是中国古代用人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飞跃，其进步性体现在科举的平民化效果，即科举的开放性、公正性。^④ 科举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确立了由政府出面招考、考生“皆怀牒自列于州县”的自由报考原则，考生几乎没有身份、阶层、职业等限制，除了娼、优、隶、卒等“贱民”外，其他人均可参加科举考试，这扩大了应试者的范围，反映了科举的开放性特征。^⑤ 科举制的开放性突破了血缘关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广大下层民众有了入仕机会，体现出一种平

① 邵作舟：《邵氏危言》（卷下），商务印书馆1898年，第4页。

② 顾颉刚：《中国考试制度史·顾序》，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考选委员会1936年。

③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731页。

④ 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1页。

⑤ 据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统计，清代约有二分之一的生员出身寒微，而明清两代进士中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占42.9%，这进而说明了科举制度的开放性特征。

等精神。为了确保这种形式上的平等，科举取士本着“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原则，公开竞争，择优录取；为了确保这种竞争的公正，科举考试有着一整套详尽而又严密的规则，以防止越轨行为，如锁院以防漏题、搜检以防夹带、监考以防偷看、糊名誉录以防关节、内外帘之隔以防串通作弊、场后复试以防冒名顶替、考官回避制度以防徇私舞弊。科举制在形式上的平等、公正制造出一个“空前伟大”的烟幕弹，给每一“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为草野寒峻之士开辟了登进之途，增加了社会内部的流动性，消解了社会内部的张力，适合于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因此它能超越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并存上千年。

科举制度在形式上标榜“唯才是举”，注重机会均等，强调公正、平等，这与西方的贵族等级制、政党分肥制相比，“没有操纵的提名，没有伪君子卑鄙的争夺，没有两党可耻的争霸，没有混战或腐化的选举，没有仅凭巧言而能登入仕途的现象，在最善的本意下，它是民主的，因为它给人争取领导和职位的机会是平等的。”^① 所以美国学者顾立雅（H·G·Creel）认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le）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崔瑞德（Dennis Twitchett）也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经过以后的长期发展几乎被全世界所接受，许多世纪以后，这一制度为所有西方国家以考试录用人员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一个遥远的榜样。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也指出，一般的人们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无非是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而实际上比这些物质发明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它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选官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② 英、法、美等国正是借鉴了科举考试的合理内核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同是科举，作为舶来品移植于西方土壤上，变为一种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的物种，而在中国却成为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乃至衰败的祸源之一。因为科举制作为支撑封建官僚政治的杠杆和调节器，有效地制衡并调节着封建社会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其尊经义、重文辞与轻自然、

①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台湾）幼狮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第196页。

② 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斥技艺的特点又导致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乃至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①这也是对科举制度在中国命运既形象而又精辟的论述。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败，科举制度也败相丛生，特别是明清时八股取士，摧残人才，钳制思想，祸害尤烈；纲纪败坏，作弊成风，科场案层出不穷。这表明科举制度的生命力在前近代社会就已消磨殆尽。

当历史翻开近代一页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转型，政治改革大潮涌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欧风美雨劲吹，这样科举制度因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而在近代发生严重的危机，终于在封建制度行将就木之前便告终寝。

二

有关清代科举制度问题，前人做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是清代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如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征引了多种史籍并参考了各类杂志和私家记录，对清代科举考试各个方面内容都作了详细介绍，内容丰富，考订周密，源流毕见，为中外治科举制度学者所称颂。^②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则对科举制度在清代的嬗变以及清代的科举教育、民风士习作了详细研究，还着重阐释了科举制度在清季的因革损益及废止的过程与原因。^③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辨》对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廷试、复试、宗室科目、增广学额、搜落卷制度、状元的选拔及其地域分布等考证辨析，澄清了历史迷雾，深化了科举研究。^④此外，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沈兼士的《中国考试制度史》、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研究》、杨学为的《中国考试通史》、

① 转引自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69—370页。

②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③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④ 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沈阳出版社2005年。

刘虹的《中国选士制度史》、刘海峰和李兵的《中国科举史》、房列曙的《中国历史上人才选拔制度》等也涉及清代科举考试制度。其二是清代科举制度的专题研究，如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对清代殿试作了详细的考辨。^① 宋元强的《清朝状元》详细罗列了清代 112 科状元的姓名及其履历，并探讨了状元的地域分布、家世游学、政事德行、著述学识等，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清代状元的力作。^② 邸永君的《清代翰林院制度》对清代翰林院之起源、建置、职掌，翰林官之遴选、培养、任用等作了系统的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③ 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以《清代硃卷集》为基本史料，以科举家族为研究视角，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社会流动、地域变化、家族影响等方面探讨清代科举家族，并对清代科举家族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评价。^④ 李润强的《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通过分析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的关系，指出了科举制度导致了进士群体的衰败也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进士群体最后把科举制度送进了坟墓。^⑤ 张亚群的《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侧重于从高等教育角度审视晚清科举制度，探究了晚清科举危机与新式高等教育的产生、科举改革与新式高等教育的演进、废科举对高等教育转型的重大影响等。^⑥ 其三是清代科举文献的整理，如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房兆楹等编《增校清代进士题名碑录》，王戎笙等编《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清代部分），王炜编校《〈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等。

海外研究清代科举的代表作是傅吾康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该书回顾了 1900 年之前科举改革的历程，探讨了 1901 年之后科举革废的过程，指出科举制的废止是传统帝国灭亡的开始。^⑦ 艾尔曼的《明清科举文化史》从文化角度研究科举，考察了清朝早期科举改革内容，梳理了晚清科举改

① 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天津大公报社 1933 年。

② 宋元强：《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

③ 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④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⑤ 李润强：《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⑥ 张亚群：《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⑦ Wolfgang Franke, *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3.

革误区，此书是海外学人研究科举制度最详尽也最有价值的著作。^① 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关于社会流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举考试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肯定了科举考试对明清时期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②

科举制度在近代结束了它上千年的历史，这里既有考试内容的空疏等内在的原因，也有西学的传播等外部的因素。王德昭在《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科举考试，在实行的制度上历代虽有因革损益，然清承明制，即以清代所实施的制度而言，行之也有五六百年，则其卒遭废止，其历史意义及其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的影响的重大，可以想见。”并指出“清政府之认真考虑变通科举，乃在海禁开后，西潮迫来，国家处境大变，新时势要求新人才，而新人才的作育要求新教育。传统的科举考试既无以应新时势的要求，于是新学校建立，卒至取明、清两代行之已百年的学校与科举制度而代之。”^③ 刘海峰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认为，“清代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发展到相当完备程度，但是，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尤其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被动地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社会实际需要日益不相适应。尽管清代统治者多次图谋改革科举，但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科举不得不走完其漫长的历程，变为历史陈迹。”^④ 何怀宏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分析了选举社会内在的矛盾和困境，以及西方冲击给晚清社会带来的新形势、新问题，从而最终导致科举制度的终结。^⑤ 傅吾康在《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中详细描述了科举制度在近代是如何走向衰落并认真分析了其原因，指出西方文化的冲击是科举制度终结的重要原因。沈其新将科举制度废除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首先，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是科举制度废除的基本原因”；“其次，广泛兴办的新式学堂是科举制度寿终的直接原因”；“再次，日趋没落的书院制度加速了科举制度的废止”；“最后，社会心理的变

①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e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00.

② 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2.

③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6页。

④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⑤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第三编），三联书店1998年。

迁，促成了科举制度的消亡”。^① 郑焱认为鸦片战争后人们多次试图改革科举制度，然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成，清末新政使得社会再次提出废除科举要求，而此时清政府权力的变动、新教育思潮的兴起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使得废科举的各项社会条件日益成熟，遂于1905年废除科举。^②

尽管有关科举制度衰亡研究成果比较多，但是大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与现象的分析，从文化角度切入研究的可谓凤毛麟角。文化是社会的灵魂，近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一种新文化。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必然与近代文化发生内在的联系。这是缘于近代文化不但影响着科举改革的进程，而且规定了科举改革的内容，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并最终促使科举制度的覆亡。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化角度探究科举制度的衰亡。

本书尝试从文化史角度入手，把科举制度的衰亡放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大背景中，以近代文化的发展为内在理路，以科举制度的变革与消亡为研究线索，认真考察科举制度变革的历程，深入探讨近代文化对科举制度的影响，进而开阔科举研究的视野，深化科举领域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设想，本文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一）近代社会的变迁对科举制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二）人们在近代是如何认识科举制度的？这些认识是否切合实际？人们对科举变革提出哪些主张？这些主张有多少付诸实施？（三）人们的价值观念在近代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科举制度造成怎样的影响？（四）近代新教育体系的生成给科举制度造成多大的冲击？（五）晚清科举政策有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科举改革产生哪些影响？（六）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社会各界又是如何反思科举制度的？

由于近代文化内容的广博与形式的多样，它对科举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譬如近代国人对科举制度的认识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对科举改革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文化遗产与教育普及有何作用？这就给本课题的研究增加了不少难度，使得研究课题的涉及面更

① 沈其新：《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广州研究》1987年第11期。

② 郑焱：《一九〇五年度科举论》，《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广，头绪更复杂。

为此，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深入挖掘史料，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式，运用纵横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纵向考察科举变革的历程，从横向探究科举衰亡的文化因素，力求宏观论证与微观阐释相统一。这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透视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轨迹，更好把握近代社会大变动的真相，还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凸显出近代文化演变的特性。同时，在世纪之交，学校考试的改革迫在眉睫，公务员考试也亟待完善，科举制度衰亡的研究不仅可为当今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教训，而且也对深化当前考试改革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第一章

近代社会转型与科举制度革废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后，到了清代后期，已是暮气沉沉，缺乏生机与活力。而此时西方社会经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古老的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炮舰的轰击和商品的冲击下，难以再照旧维持下去，于是被迫向着以西方社会为典范的社会转型。而同样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也因无法适应转型社会的需要而发生全面危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第一节 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从一个独立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外敌的入侵，内忧的加剧，迫使古老的中国挣脱传统的锁链汇入近代世界的洪流之中，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

当世界资本主义以其强大的力量楔入中国，打破了它“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后，古老的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的经济格局之中。^① 这样，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政治侵略与经济掠夺，不得不把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传入中国，使中国能满足其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页。

略与掠夺要求；而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的侵入“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①“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②中国社会经济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随着“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③。”古老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蚕食下开始土崩瓦解。这首先体现在家庭棉纺织业的瓦解。家庭棉纺织业是自然经济的基石，也是维系封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它的解体既削弱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又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土而出扫除了绊脚石。

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影响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解体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工业开始蹒跚起步。鸦片战争后，外国工厂是古老东方大地上最早出现的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大机器生产企业，对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起到催化和诱导的作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则是近代工业的起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认识到“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费”。因此“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④为此他们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与民用工业，揭开了近代化的序幕。随后，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产生了。

与经济变化同步的是政治变化。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家主权丧失，领土完整遭破坏，中国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清政府也逐渐沦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成为列强在华的忠实代理人。但中国社会在沉沦的同时又萌发出新的生机，这就是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与民主革命的高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灵魂附着在科学技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4页。

④ 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1、35页。